

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

新时代文学的世界意识、时代主体与未来想象

□曾攀

回到传统和历史的未来想象的过程,不可或缺的是前瞻性、包容性和创造性,这是实现跨越古今的创造性转化,以及贯通中西的创新性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呼啸前行的大时代之中,文艺创作可以说是不进则退,如何切合自身实际的同时回应历史命题,通过外在的变革契机激发内在的创造,这是文艺观念再造与文艺实践创新的深层规律。

二

从“世界”中回来,迟子建的小说《白釉黑花罐与碑桥》回归民族传统与历史叙事之中,贯穿故事过程的白釉黑花罐,以及小说结尾处卒章显意的碑桥,既是一种微缩和凝练中建立的陈列和讲述、复制和再现,同时也是对于文化传统的象征化和征兆化。更重要的,这里面包含着历史反思和价值重铸的过程,高度的仿真和还原,达到想象和再造的功能。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文化传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中得以不断延续,绵延几千年,并且还将流播至深远。迟子建在小说中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形构典型、塑造经典,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更往深一点说,言说中的纪念是一种召唤,是一个复活的过程。这是很有意思的,召唤和复活有助于唤醒民族意识并重建历史记忆。

在这其中,“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因而,“人民需要文艺”与“文艺需要人民”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也意味着“文艺要热爱人民”。潘向黎的小说《兰亭惠》写的是最广泛的市民人民的生活现场,具体说是一个请客吃饭的故事,老夫妇人宴请前准儿媳,叙叙旧情,做足告别和分离的礼数,也为儿子接下来的情感和婚姻铺平道路。在他们身上可以体现出上海市民社会的观念形态、生活现场和情感模式。当代中国数十年来城市化进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取向,构筑了一代人特有的伦理观念和生活信念,形成作为“市民社会”的上海或说任何一个中国现代化城市的精神基底。毫无疑问,好的文学创造的“人民喜闻乐见的的生活”,其从生活中来,回到生活中去,并且从侧面、前方或更高处观照生活。陈彦的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中,半棵树也许意味着人心与世道的裂解,彰显出当代世界的多重分化。陈彦从特定的“舞台”开始重新走入乡土与人心、自然与天地,凡俗时景、人世纷扰,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错统摄下,头顶的星空平等地属于每一个人,天上的星群对照乃至指引

着地下的人群。小说试图以一种新的道德律,填补世间的残缺与个体的差异,观照命运的沉浮,也警言、也告慰,也惋惜、也悲悯。凡一平的小说《上岭恋人》,回归故乡,回到作者念兹在兹的上岭村,那里有恋人、产婆、保姆、裁缝,也有侦探、说客、歌王,等等,作者意图为一座村庄和那里日夜奔忙的人们立传。可以说,从陈彦的星空诗学,到凡一平的世间群像,天上的或形而上的星空与星链,切近着日常“人民”的谱系,这同时意味着精神的脚踏实地与跃迁飞翔。

何向阳的诗歌往往在纷扰的尘世中体悟情感的丰厚和思想的锐度,其中充溢着种种缠绕、穿透与超越。种种相及与不相及的物形与人像,指示着一种万物关联的诗性。一首《你说》:“你说你爱百花盛开的春季/而我却浸透了秋的忧郁/步履蹒跚地走向冬季/你说你是天空闪亮的星座/而我却属于无光的岛屿/独自承受海浪的拍击”,我和你、生与死、闪亮与黯淡相互纠缠,与此同时又能击穿表象的淤积,穿透迷雾的蒙蔽。《红尘》中写道:“以后的征途/为心底的哪团/火焰/为长眠的/哪片时光/为谁/为哪一个人/我会交出这个不屈的/灵魂”,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既是了悟与禅思,同时更意味着一般意义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和思索,代表着当代个体的感觉结构生成的过程。因而可以说,文艺塑造的新时代主体是丰富多元的,他们追寻自我的生活与生命,也执着于现实与未来,更重要的,他们于期待满怀中,敢爱敢恨,有情有意。锦璐的小说《复调啾秋莎》写老朋友们久别重逢,人世倥偬,翩然而逝,然而有些创伤和烙印是伴随终身的,人们的“梦想和期望”自然难以忘却,“爱恨和”也恐难释怀,于是乎历史的记忆成为了精神的恒量。一代人的《啾秋莎》唱了一出又一出,还是分毫不弱,铿锵依旧。

近年来,文学地方性的议题方兴未艾,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新西部文学,等等,不同的地方性此起彼伏,争奇斗妍,构建着全国范围内的文学百花园。这些流派或群体,不仅有文化寻根式的价值追寻,而且面向当下、未来和世界,他们的写作充满异质性,同时又内蕴着不同艺术理念的对话,

在文学技艺和修辞形态上较之以往更多有突破,在作品的数量与质量上也甚为可观。东西的小说《天空划过一道白线》是经典的寻找和等待的主题。语言挤干水分,如坚硬的藤条抽打焦渴的灵魂,人的瘦硬的内心在这里显影,不断感受到疼痛,觉察自我的与世界的苦难。小说同时又叙写着消失与再现、出走与回归,在“南方以南”触及如此宏大和丰富的母题,非常耐人寻味。

传世之作总是能够穿透时间的迷雾,在历史的流波中逐浪激荡。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深入人心自不待言,尤其孙悟空的形象集七十二变于一身,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却一以贯之地保持着他的纯粹和忠义,也守护着自我的率性与血性,近来火爆全球的电子游戏《黑神话:悟空》,通过独树一帜的叙事形态、精致画面和文化意蕴,极佳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独特魅力——深度挖掘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体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通过对经典素材的游戏化演绎,展现了中华文明在时间长河中的更新与创造。《黑神话:悟空》采用了先进的游戏引擎并激发出绚丽的视觉效果,创造性地融汇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这无疑是中国原创力的重要体现,不断更新的艺术手法融合当代科技、媒介、观念的创造,往往能够生成非同寻常的艺术作品。随着《黑神话:悟空》在全球范围内的关注,这款游戏成为了文化输出的样品和精品。由此可见,优秀的文艺作品可以打破语言和文化壁垒,获致世界品质并于全球流通。

因此,这样的经典作品不仅能够吸引、导示和启迪人们,而且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面形成了一种重要范型。其充分证明了优秀文艺作品在文化传播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回到传统和历史的未来想象的过程,不可或缺的是前瞻性、包容性和创造性,这是实现跨越古今的创造性转化,以及贯通中西的创新性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呼啸前行的大时代之中,文艺创作可以说是不进则退,如何切合自身实际的同时回应历史命题,通过外在的变革契机激发内在的创造,这是文艺观念再造与文艺实践创新的深层规律。不仅如此,时代的变革带来的文艺巨变,也促进了创作

主体性的极大丰富,诞生了“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不同时代主体与创作主体的竞相创新,绘制出关于未来想象的内在驱动力,这是优秀文艺作品形成与衍生的重要路径,也是提升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在中国文艺走出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需要指出的是,这也是中国文艺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在这个历程中,未来的想象并非一蹴而就,既需要从深具创新意识和社会风气中逐渐孕育,而且通过制度保障创造出富于生长性的土壤,由此形塑主体内在的精神机制以及总体性的文化心理。

三

陈春成的小说《夜晚的潜水艇》叙述“我”在上学期与平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天马行空的幻想、幻梦中的潜水艇前行于茫茫黑夜,在翻腾的大海中打捞博尔赫斯的硬币,足够不着边际,又足够合乎情理。人类于不同的平行世界中展开自我的想象,蓬勃绽放的想象力从“我”行之所至的无数瞬间生长出来。“无数个世界任凭我随意出入,而这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罢了。”方舟的《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对那些失落的瞬间,以及值得重塑的时刻。平行世界似乎存在着种种奇观或奇遇,但是生活里却是无处不在的凡常和俗常,更多的时候需要激荡百千种想象如探寻“沉船”的去影留踪。鲍尔吉·原野长篇小说《乌苏里密林奇遇》亦是如此,开阔又深邃,奇异又寻常,非常细腻的描述,却又有着辽远而宏大的意指,其中富于异质性的文学表达,从地方性走向隐喻和童话,走向历史与地域的深处。小说里面提到一种通灵者,也许小说也是这样的通灵的存在——既是一种形而上的幻想与幻境,更关键在于能够以虚构御向实在,通往一种想象的。如前述陈春成所言:“当幻想足够逼真,也就成了另一种真实。”

三三的小说《小楼昨夜又东风》表达了一种独特的忧虑和悲悯,喜剧的戏谑中包孕着悲剧的内核,自嘲与自悯在这其中所在多有。乔乔戏里戏外都是边缘人,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戏里的人生、人世里的戏份,都在心酸的现实与理想的遥望中彰显无遗。对照陈春成航行于深海的“潜水艇”,试图重拾人们“潜到深处”的能力,那是最隐秘的内心宇宙,更意味着想象力统摄下的深邃而广袤的未来世界,对于文学而言,接通和融汇、转化与创新值得何其重要。《夜晚的潜水艇》里,“我握住台灯,望着窗外的夜色,对自己说:Captain Chan,准备出发吧。”如此似乎可以呼应前面梁豪小说《世界》中沈夏的“等我回来”。这是宣言式的姿态,是对于未知路途与未来世界的决然行径,透露着对于自我以及未来的期许;与此同时,也代表着文学本身的呼号和询唤,那便就此“回来”或者“出发”吧——“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作者系《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

文学名刊
新作扫描

2024年7-8月《收获》《上海文学》《天涯》《作家》《芳草》:

勘探自我与世界的意义

□周乐天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一年一度的《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理应是浪尖上的栏目。无需遮掩,这一回最打动我的作品,是杜梨的《涓涓》。这篇小说讲了什么?一次“凶宅”购置、一个真实梦境、两对伴侣、一场命案、既玄幻又科幻……这是一个颇为精彩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是,该作具体而生动地展现了如何以文学之想象为今天的现实图景添上几笔有意义的亮色;如写女主人公从那些接地气的“新中式”物件与“中华攀雀”的生活中获得滋养与勇气、如写男女主人公之间清新而深沉的感情等等。杜梨的文笔犹如刺绣,以每一针的精准来实现整体的细密繁复,同时还具有一种难得的适当的幽默感。傅忌的《吃黄昏》则完全是另一种写法,叙述极稳妥,甚至略有些温吞,直至最后,一碗饱含乡愁与尊严的“姜汁炖蛋”顿时成为一根锋利的刺,为女主人公不知所措的生活带来冷冽的痛感。坦率地说,与上述两作相比,我认为该专辑其余几篇小说似乎尚未充分准备好自身来“对付”这为世人所共享的丰富的生活世界,或迂回踟蹰、或略显心急、或暂时无法让凝滞的私人记忆变得澄澈……但这不也正是青年再正常不过的、可贵的模样吗?

《上海文学》第8期“文本探索专号”发表了四个短篇,其中《倒纪元》《机器人学》《风切变》为科幻作品。《倒纪元》设置了一个“倒纪元元日”,

此日之后,不再有新人类诞生,死于此日之前的所有人类则将依次复活,人类历史彻底倒序播放。《机器人学》一篇将机器人家族与机器人构造学结合在一起叙述,作者用心严肃诚恳。《风切变》以查案的方式写一款人工智能与其开发者之间的羁绊,故事跌宕又利落。不得不说,今天的科幻作者们已经拥有一整套较为完整丰富的词汇与题材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现实了,此刻我们一面憧憬或忧虑于人性的未来,另一面也应以更强烈的紧迫感与责任感来理解、诠释人性的前世今生。杨莎妮的《草中商厦》讲的是“我”和马克涛(两个彻底的i人)的交往与奇遇。按理说,这故事并不新鲜,近些年来青年作家们就热衷于“内向”“社恐”等主题,但作者设置的“咨询师”“黑猫”等角色、元素,以及通篇那古怪又奇妙的小说语言,一同营造出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在我看来,作者笔下主人公在大厦下河滨小公园的灌木中躲避人群的段落,是全篇最精彩的描写。“i人”独处充电,作为一种近乎于满足生理需求的行为,被这些描写诗意且精准地捕捉到,释放出一种奇特变式的生机勃勃的自我肯定感。池上的《如果海水分开》(《作家》2024年第8期)写一个核心家庭外出旅游时的遭遇,作者精准地为我们照亮日常生活中的裂隙,这些裂隙是如此深邃、如此难以合拢,使得孱弱的个体不得不发“如果海水分开”这般大

愿才有可能反抗绝望。

白琳的中篇《布达佩斯咖啡馆》(《上海文学》2024年第7期)让人想起韩国导演洪尚秀那些高度风格化的充斥着各种谈话的电影。主人公“我”在布达佩斯城内的五个咖啡馆里,和新识旧友聊彼此的生活与情感,同时也听着咖啡馆里的陌生人们聊着自己的遭遇。这些谈话作为小说的主体内容,犹如无意汇入河道的溪流,不致力于构成前后贯通的主要情节,但读者依旧能从中体会到当代生活的一些特质与命题,如情感模式的多样与脆弱、普遍失落氛围下个体的不适与不甘等。小说中大量关于咖啡馆建筑细节与各色食物的描写,可被视为谈话的“物质基础”,代表着异国中产阶级生活文化,给人一种“过于丰富而口感混乱”的感受。同期《上海文学》刊发的三个短篇《定锚婴儿》《一个二十五岁女孩的一生》《东京候鸟》也都是异国故事,三位作者聚焦于各自主人公生命中的决定性时刻(或时段),为读者敞开了人物的命运。

遍历近期各刊物中所发表的诗歌,我的直接感受是诗人们的表达缺乏最朴素意义上的“诗言志”这一维度。我读到了许多意象、意图,但鲜少读到清晰明确的关于自我与世界的意思、意义,即使有,也常常是以一种呢喃、氤氲的散文语调暗示、“散发”出来的。因为这一或许主观偏颇的判断,我愿意强调诗人蓝蓝的写作

的重要性。她的组诗《修辞与沮丧的诗人之歌》(《收获》2024年第4期)以一种今日罕见的极具穿透力的铿锵语调,表达了自己对于“象征”“隐喻”“古典主义”“现实主义”“诗人”等概念、形象的看法。这组诗中的蓝蓝具有这样一种品格,即她能够将把自己私人的体验转化为一种言说与判断的勇气与能力,直面一系列客观的命题,而非任由私人体验漫溢于诗行之间。这样的写作就是一次捍卫诗歌尊严的“诗辩”。倪湛舸的组诗《我的爱人皮埃尔》(《上海文学》2024年8月号)用一种童话般忧愁而清澈的语言编织出“皮埃尔”这一形象。诚实地说,我发现自己很难把握这一形象。在诗人笔下,皮埃尔似乎是一个想要取消自己的“人类”属性的人:“皮埃尔什么都听不懂,他早已丧失了学习的热情,他捂住耳朵和眼睛,说这里没有人。”与蓝蓝那肯定的、钻石般的语言不同,倪湛舸用复沓、振荡的句子展现了一种趋向于“否定”的诗歌感觉,一种坚决地想要“避让”乃至“退出”现状的态度,而诗行中的童话感又确保这一有些灰色、抽象的主题是在一个五彩缤纷、具有活力的世界中生成的。这样的诗歌能使读者在困惑中领会到一丝奥秘,感知到某种寄身于文学的可欲求之物的存在。

还有散文。黑陶的《中国房间(之四)》(《芳草》2024年第4期)以笔记体写就,别具一格,每

一则都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一个地点、一处景观、或是一个关键词。不过,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房间”这一说法。按照我的理解,“中国房间”至少可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将“中国”比作“房间”这一人们安顿心灵的单元,透露出亲切的归属感;第二种,“中国”包含着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房间”,等待人们去清理,去布置,去为之奋斗。于是,至少内蕴这两种解释的“中国房间”,不也就高度概括了我们在今天读到的各种游记与关于风土的散文书写?还可以就此提问:“房间”与“房间”可否连通?无数个“房间”如何构成“建筑”?如何在作为空间的“房间”中发现时间?……在《蕪州记》(《芳草》2024年第4期)中,舒飞廉写自己如何在今天的蕪州城里找到16世纪60年代的李时珍与吴承恩。极有趣的是,他此次考察的“据点”,是一个被装修成婚房的小镇酒店房间,找资料、写作的工作台,则是房间里的一张麻将桌。正是在这一洋溢着生的喜悦、接着地气的“中国房间”里,他感受到李、吴“二位先生在各自的油灯下奋力笔耕”,连通了今与古。今年第4期《天涯》的散文栏目提出了“自述式写作”这一概念,以期让“普通人以自述的方式参与历史的叙述”,其中邵霞的《自由行走的花》与李方毅的《南方漂泊二十年》两篇作品提供了难得的来自普通人的第一人称叙述。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